

排除政治對產業發展的干擾

郭 位

出訪巴黎，在地鐵站處處見到中文簡體字與韓文醒目並列的指示牌，感受到中韓在歐洲大都會引人注目的程度。由此想起四小龍中的台灣。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廠商各自為政，難以匹敵以政府為統帥、以國家政策為指導綱領的競爭對手。以資訊業為例，韓國推出國家資訊化目標，估計到二零一五年，80%首爾市民將隨身攜帶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

相比之下，台灣也訂立過二零零二年的「兩兆雙星」與二零零六年的「品牌台灣發展」計劃，二零零九年和二零一零年又分別提出六大新興產業和四大智慧型產業；但社會對此並不重視。受優先保衛政權的影響，台灣多年來雖有計劃嘉種下地，可惜黨派之爭使得產業偏離民生福祉，加以口號泛濫（這一點倒是兩岸三地，難兄難弟，有志一同），缺乏雨露滋潤，抑止了繁榮生長。比較顯著的有核四和航空營運等事例。

核四計劃在一九八零年代提出，幾經周折，過了二、三十年，花費逾百億美金，至今不上不下，是否商業運轉仍無定論。繼續還是不繼續，總該給個交代吧。倘若計入時間價值與運轉損失，全民承受的代價實在驚人。

台灣百分之九十八的能源仰賴進口，全民享用超級廉價電力，而平均

每人年用電量屬四小龍之最。從以價制量角度看，補貼猶如變相鼓勵民眾與企業浪費寶貴的能源；適時、正確反應不同能源的價格才會有節能、環保的誘因（見 2011 年 11 月 3 日時論廣場）。由於政治意識凌駕民生福祉之上，台灣至今未有中立於政黨屬性、救命自保的能源政策。

我於一九九五年擔任德州農工大學工業與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當時服務於達拉斯美國航空公司的校友銜命造訪，探尋以桃園機場作為遠東轉運樞紐的可行性，最終了解台灣政府反對三通，此計未成。美航的結論有道理，因為若無三通，桃園機場並不具備承擔轉運站的條件。如今看來，無論贊成與否，三通已成事實，桃園卻與轉運樞紐錯失交臂。時機不再，台灣因此在文化、觀光、貿易、物流、國際交流等方面有形無形的機會損失(opportunity cost)，就請大家當作習題演算推導一下吧！

在政治紛爭糾纏不已之下，台灣產業政策多年來採取不積極、不主動、不接觸、似有若無的頹廢無不立場。核四計劃的延宕、航運的被動性，像是敗家子行徑，希望不是新台灣文化的表象。

當今科技產品層出不窮，促進並帶動全球經濟發展。制訂政策，要洞察先機，未雨綢繆。新加坡小國寡民，對產業和創新勇於拚搏，不失時機自我調整，於二零零三年瞄準趨勢，創辦生物科技園，翼求成為藥物和醫療設備的世界級研究基地及製造中心；二零一零年又訂下十年發展大計，立志成為「高技術人口、創新經濟體的全球性都市」，有可資取法之處。

也許有人認為新加坡不夠民主，不宜比較，那麼看看韓國吧！韓國經歷多次政黨變革，無損政策連貫性，民主發展對經濟進步起到正向加成作用。台灣雖然也在民主化道路上邁出大步，但它究竟是民生助力抑或是阻力？這些年來，社會陷於政治對抗的淤泥之中，經濟議題朝令夕改，政府沒有宏觀的科技政策，兩黨執政都不能網羅長才主導科技國政。文化推廣也少有考慮到科技因素，屢屢拿著雞毛當令箭，一再顧此失彼，如何期望大步邁向明天？

產業發展，就消極而言，要排除政治干擾；就積極而言，要重視製造業的基本面，避免動輒倚賴政治、經濟手法救一時之急。新加坡或韓國，一個人口數與土地面積比台灣小，另一個則比台灣大，兩者都是學習的對象。我們偏偏喜以東方的瑞士自詡。殊不知，瑞士是一個中立、均富的社會，台灣須在民生福祉上建立共識，排除政爭對產業發展的干擾。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引個諺語，不要畫虎類犬，陶醉於一個自我感覺良好、均而不富的社會。

郭位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